

篇名

《李自成新傳》研析——從農民戰爭下看人性

作者

曉明女中 高中部 二年丁班 41 號 劉詩亭

書籍

書名主標題：李自成新傳

著作人：謝承仁

民國八十二年／初版／桂冠圖書公司／台北市

《李自成新傳》研析——從農民戰爭下看人性

壹、引言

明末政治腐敗，年年災荒，弄得民心不穩，「人民相食，至不忍言」的記載，史不絕書，實在令人不寒而慄。當初本是聽父親述說，才開始對這歷史課本中短短三行敘述的「明末農民軍（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產生興趣；後來又聽說大陸對李自成的成敗還另有看法，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李等人有其他新的評論；其中我又對從闖黨開始到後來天啓初年之間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以及越演越烈的官民衝突感到興趣，在明末這樣極盡腐朽、黑暗的政治環境之下，當時皇帝以及明官的做法與其心理是如何？以張獻忠、李自成等為代表的“流寇”又如何抵抗？而飽經戰禍的人民又是怎麼面對？這些都是極具啟發的課題。且先不談大順最後的失敗，本文只針對崇禎年間的變局加以討論，希望能藉由多方面客觀的探討，對「人性」能更了解、更深入些。

貳、正文

一、明末的敗亡亂象：

十七世紀，「萬曆朝是明朝封建統治由盛而衰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時期。萬曆後期，朱翊鈞（神宗）晏居深宮，聲稱有病，二十餘年不見群臣，不問朝政，醉生夢死……『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他）先後派遣大批宦官，分赴各地，收稅開礦，敲骨吸髓地對人民進行搜括。」（註一）

福王朱常洵，「『性鄙嗇而酷嗜貨財』，『日閉閣飲醇酒，所好為婦女倡樂』。河南連年災蝗，百姓吃草根樹皮不可得，而『王之粟紅、貫朽自若』。凡軍民人等，路過王府，無不對之切齒怒罵。浙川教諭樊夢斗勸他散財、收人心，不聽。前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進言，一點也打動不了他的心。」（註二）

這樣子皇上不上朝的情況，其實是從武宗就已存在的現象；皇帝既開了長期不上朝的惡例，群臣亦紛紛仿效。而對於明朝後期的幾個君王，似乎都比較自私自利，且玩性亦重，棄自己應盡之責於不顧。是因為生活太安逸，且君王為上的思想隱隱暗示著他們，「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整個國家都供他享有，在高位之人若非聖賢之人，也要把持力夠好，才能不因自身惰性累害他人。「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是百姓有糠粃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夕？」（註三）由此可見皇帝的自私態度，他想保自己家財富萬貫，卻從此失去民心而不自知。以現代觀點來看，國家領導人是“公僕”。而帝制雖是以帝王為上，但仍不脫「領導人民，為民做主」，以自身私利為重

也罷，但這樣不關心民間疾苦，可以說是背離其身為君王應有的責任。整個朝廷從上開始腐敗，政務荒殆至此，國家豈有不亡？

「從一六三〇年代末期開始，通貨膨脹的問題日益嚴重。罕見的自然災害，也在明亡前的最後二十年，在中國各地為老百姓帶來嚴重的飢荒和瘡疾。崇禎年間，大量飢民湧入城市，以乞討或盜賊維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註四）

如此大致說明了那時人民的情況，可以說是苦不堪言。天災人禍、稅役日重，交完租便所剩無幾；尤其是又遇閹黨為亂，任意侵占良田；而後還有種種「加派」：除正額外，還有「遼餉」、「剿餉」、「練餉」（註五）等等；再加上地方修魏忠賢生祠、諸王造王府、皇帝修陵墓。可見明末徭役之重，使得人民生活更相當不易。

二、李的為人與對人民的態度

李自成是陝西米脂人，性喜武藝而不愛讀書，認為那沒有出路（註六）；其實就當時情況確是如此。「邪人當路，賄賂公行，幾於不成世界」（註七），只有有錢人家的孩子讀得起書、行得起賄，一般老百姓要走仕途幾乎不可能。而且李家境貧苦，十餘歲就遇到大災荒，家中沒吃沒喝，甚至還當過和尚，也給人放過羊，備受大戶的打壓。其後雖然曾在官府當兵，但最後卻脫離官軍，加入農民軍；崇禎初年，農民叛變是越演越烈，由地方獨立的小叛亂漸漸團結起來成為一股強大農民軍勢力（如三十六營），李就在這時輾轉投奔闖王高迎祥。目前為止，以一個還未做過什麼大事的李自成而言，仍只是一介平民。他轉而投奔農民軍顯示了當時人民多已由對官府失去信心轉變到不得不造反，只求能創造一番新局面；所謂官逼民反，當往左是死，往右亦是死時，便寧願選自己較贊同的一方——加入農民軍打仗，而不願待著活活被欺壓。在這樣動亂的時代，人人不免只為自身著想，因此加入農民軍便可推測是當時人民覺得「對自家比較好的方式」。

「李自成下令，散發王府、富室大米數十萬、金錢數十萬，大賑飢民。並對飢民說：『王侯貴人，剝削窮民，不顧百姓死活凍餒，我殺他們，就是為了你們！』……飢民們扶老攜幼，人群日夜絡繹不絕，數以百萬計。」（註八）

事實上，這就是農民軍起義的基本目的：打擊霸道的地主、不講理的官府，劫富濟貧。這是人民為了求生存而被激發出來的想法，越是活不下去，越會走向這樣偏激的道路。我們都知道殺人是做不得的事，但是當初相約（立法）不殺人的人們，其實就是希望生命能互相有個保障。明知冤冤相報無時了，而相繼定下法律、發展文明的人們，起初都是為了能互相保障人的生存、血統的延續；一但這樣的保障不再，生存受到威脅而又無公道處訴冤時，理所當然會變成這樣了，這是他們認為最後能追求的「公道」。以儒學勤儉立國的明朝，最後卻

走向這樣的道路，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李自成的為人，在本質上和張獻忠不大相同，就是官書的《明史》都稱讚他“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看他很能收攬民心，禮賢下士，而又能敢作敢為的那一貫作風，和劉邦、朱元璋輩起於草澤的英雄們比較起來，很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氣概。」（註九）

像李自成這樣的人，便很適合做平民的代表和領袖，並不一定是皇帝，而是說很適合帶領人民在逆境中奮鬥。願意與民軍同甘共苦的人是不可多得的，至少在建立大順朝之前，他都將民生疾苦擺在第一位，攻佔城市後也盡量不殺人民，還開倉濟貧，對那些貧民而言，的確是一大幅音。而能得到大多數人贊同者，就是這幾位看來「頗有勝算、實力堅強」的農民軍領袖了。

三、李自成的主張：

在李岩等人的建議和幫助下，李自成加強宣傳政治、維護軍紀，並提出『均田免賦』的土地政策和『平買平賣』的商業政策。

1. 均田免賦

均田的具體內容，因為記載缺乏，只知道提出後，凡農民軍所至，「該地權貴、顯宦和豪門富紳，或被殺掉，或被留做人質，其家所田地、房宅、錢財、稻粟，皆被沒收。農民軍將沒收來的財物、糧食，部分賑濟飢民，部分留作軍用，將沒收來的土地，或募民墾種，或直接分給農民，發給牛、種、令其耕種，收齊籽粒。」（註十）

至於免賦，一為免糧賦、一為免差徭。李自成曾發布過多次免徵文告，但沒有一定標準。「崇禎十六年李自成佔荊州，『出示安民，傳繳取役糧冊』，說明農民軍對徵糧一事仍很重視，並非一律全免。」（註十一）

2. 平買平賣

「崇禎十五年春，大軍攻打河南歸德府，營地延亙六十餘里，用白布搭上幕篷，使百姓擔挑百貨入營中，進行公平交易，兩不相欺，軍民關係極為融洽。」（註十二）

李岩之所以會加入李自成，除了因為他勸說富戶開倉濟貧，而被當地（河南）富豪陷害之外，郭沫若還認為，其參加農民革命有他在思想上的必然性，他懷抱著人民思想，故會投奔李自成（註十三）。他以一讀書人身分，幫助李自成加強政策宣傳，其重要性，由下可見。

「李岩入夥後，就勸李自成“尊賢禮士，除暴恤民”，“假行仁義，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李岩很懂得一些輿論宣傳的奧妙，他派人扮成商人，在民間廣布流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還編出童謠，讓小兒到處傳唱：“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歡悅”。就是在這一年，嗷嗷待哺的河南飢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惟恐自成不至”，“從自成者數萬”；李自成從此走出隱伏喬雒山中時的低谷危厄，面前展現出柳暗花明的轉機。完全可以說，崇禎十三年後農民起義軍的輝煌，李岩是多有建樹、立了大功的。」（註十四）

四、明朝皇帝、官員

以下簡略歸納對於這樣流寇四起，明朝政府方面所做的相對因應。雖然有時好像快要殲滅殆盡，但其實有所忽略，且爲了打仗，頻頻徵勞役、徵稅充軍餉，形成一惡性循環，問題沒有解決，人民訴求得不到滿足，自會不斷投入農民軍，「鄖陽撫治盧象昇曾憂心忡忡的說：『殺賊一而從賊百，殺賊百而從賊千；所殺者皆賊也，皆民也，而賊之渠與夫狡者仍在也。毋論賊不可盡，縱令賊盡，民將與之俱盡矣！』」（註十五）基本上，明朝政府在與流寇對戰是處於被動的狀態。

1. 對流寇因應之策：

採剿、撫、困三法。但流寇頑強抵抗，時隱時出、神出鬼沒，有時又有私下賄賂、故意放水的事情，所以總是剿而不盡、困而不全。而一些害怕農民軍勢力的官員，則採招撫策略，雖有成效，但是有些雖投降卻仍不願聽從官員指揮，而官員也沒有辦法，如崇禎十一年南陽戰敗後的張獻忠，寇官互賄、多所投機；而其他受撫的農民軍，卻被用各種手段殺除，造成此法久失效力。

2. 皇帝與臣下之間的懼怕心理：

崇禎年間，政局非常不安定，總理等官員撤換不停，沒有在期限內完成剿匪計畫者，紛紛降官，最後甚至換到沒有人了，還從監獄中“特赦”出來再任命，加上崇禎帝又有猜疑心理，臣下也不敢認真剿匪，自己性命還是比較重要啊！既不敢違抗軍令，又不敢認真和農民軍對抗，所以常常會有欺上瞞下的作爲，一面向上報告大捷，一面又對農民軍莫可奈何，甚至詐稱「逐賊」，偷偷投降而去。後來皇帝又用內監，安插到地方監督官員上下，然而那些內監又不會打仗，又和官員勾結而不公，其實是無利反害；但皇帝又不聽勸言，整個朝廷越發混亂。

五、人民取向

其實人民的希望不過是「國泰民安」，再來才是財富的追求，但是一開始追求財富後，往往忘記了從前平安的快樂，開始爭名逐利，進而甘冒種種危險來完成自己所欲，甚至到棄禮義、背廉恥的地步。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將人類基本需要分為五個層次，而就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人民都沒辦法滿足了，在這樣被逼到底線的情況，起義革命是可想而知的結局。

前兩者比較來看，農民軍的確較得民心，他掌握住人民受困時的心理，既然時局不好，就退而求其次，減少其他種種，只為先滿足“生”的需要，所以重視的是有沒有東西吃、活不活的下去、收成好不好、稅賦抽多少、家裡有沒有男丁之類的事，而在這樣的狀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嫌隙隔閡便會暫時隱閉，人人都讓步了，感情自會堅定而團結。此時那王公貴族們奢華的生活、仍停留在最高階的追求自我實現，看在大家都讓步的貧民眼裡，自然是更不能接受，憑什麼我們過那麼苦，而你卻目中無人的享清福？日子過不下去，便鋌而走向絕路。農民軍就利用這點，是真仁義也好，假仁義也罷，推翻富豪平分給農民，藉以搏得他們的好感；其實他們忽略了那畢竟是人家的財產，也是祖上有德積來的，如今這樣子殺人奪財，不也和當初斂財害民的鄉紳一樣了嗎？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把人民弄到如此不堪，需要冤冤相報、以血洗城的地步，不就是那些貪圖短利，極盡壓榨、賄賂、欺騙之能事，陷害老百姓的地方官員和地主嗎？而這樣與人民生活貼近的地方官員，都不能體恤人民，沒有「本是同根」的民族認知，更何況是天高皇帝遠的宮廷人員呢？沒有多少人會回憶當初建國所為為何，所以說他們短利近視，並不是他們不知有遠慮，而是不認為會到如此地步（也就是「總不會如此倒楣」的心態），人的苟安心理造成他們一再逃避問題；而皇帝也許無知，沉醉在唯我獨尊的世界裡，驕傲是難免的，而這樣的驕傲心態會接連傳下去，許多掌權宰相因此妄自尊大、為所欲為，這是人性的悲哀啊！

參、結論

戰時人民的思想剛好可以和腐敗政權貪官污吏的心態做一對照，說明人在患難中和在優渥中所展現不同的心理狀態。人不可能永遠勇敢、堅強、勤勞且善解人意，這是由患難才激發出來的；人不可能永遠團結，人的團結建立在「目的一致」或「利益相關」上面，基本的人性就是這樣。但是，現實歸現實，依據馬斯洛的金字塔，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如果可以將這樣的自我實現，由個人成就昇華到對社會的關懷、對自我的要求，不欲求不滿，互敬互愛，哪能說不勇敢、不自信堅強、不團結呢？

現在大陸的政治體制就有點像李自成所提倡的共產均分，那只是政府能做到總體的「均」，至於細部是否均便不得而知；而有些國家體制說是「較完善」，卻也有諸多沒顧慮到的地方。不管國家體制偏重範圍是大而廣還是小而深，世界本來就

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如何能在生活有保障、不違背人性的情況下，學會提升自我，發展高尚的情操不是不可能的，這不但是人類最高層次的需求，也是整個世界應該攜手前進的目標。

肆、引註資料

- 註一、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1。
- 註二、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240。
- 註三、 同註一。
- 註四、 張元，李孝悌。《簡明中國歷史》。台北縣：龍騰文化。民國 91 年。頁 209。
- 註五、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6。
- 註六、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39、40。
- 註七、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5。
- 註八、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242。
- 註九、 郭沫若。《歷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頁 166。
- 註十、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245。
- 註十一、 同註十。
- 註十二、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246。
- 註十三、 郭沫若。《歷史人物》之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 年。頁 3。
- 註十四、 馮健〈重溫《甲申三百年祭》有益〉。新華網。1993 年 8 月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2/27/content_671972.htm
- 註十五、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市：桂冠圖書。民國 82 年。頁 87。

伍、參考書目

1. 謝承仁。《李自成新傳》。台北。桂冠。民國 82 年。
2. 郭沫若。《歷史人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
3. 張元，李孝悌。《簡明中國歷史》。台北。龍騰。民國 91 年。
4. 鐵冠圖全傳。<http://www.open-lit.com/bookindex.php?gbid=225>